

■史海钩沉



磨剪刀曾是老北京一景

“磨剪子来，戥菜刀……”对这句充满韵律的叫卖，老北京不会感到陌生，虽然它几乎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。

人类历史上第一把剪刀据说是古埃及人爱德华发明的，是所谓“交股式”，用一片铁折成“8”字形，使用时猛握下部，使上部的刀刃交错，完成裁剪动作。这种设计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割的功能，切割速度快，成品整齐，缺点是太费力气，不方便细节裁剪。

我国出土的汉代剪刀、唐代剪刀，都是“交股式”，唐代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制铁业发达，并州剪、并州刀名满天下。五代时，中国出现了“支轴式”剪刀，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剪刀完全一致，它相对省力，能制作细小的东西，当时属贵重物品，在墓葬中多见，元代以后，随着海外贸易发达，剪刀已不再是难得之物。

剪刀虽小，制作却很复杂，其刀刃的部分要用钢，刀身的部分用铁。钢锋利，但易折，铁有韧性，但不够锋利。要让钢和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则需要反复锻打、淬火。制作成型后，磨剪子是一道关键工艺，通过它，剪刀才能变得锋利起来。然而，这种锋利是暂时的，随着使用时间增加，剪刀不久又会变钝。

磨剪子需走街串巷，除了吆喝外，还要动响器，以吸引不大出门的女性们，她们是剪刀、菜刀的主要使用者，所以人们把磨剪子手持的铁片做成的乐器叫“惊姑”或“惊闺”，俗称“唤头”。

老北京磨剪子是极清苦的行当之一，收入很低，老话说“劫道的不抢磨刀的”，因为知道从后者身上也抢不到什么。

磨剪刀是辛苦活，一把新剪刀制造出来，要经专业磨剪刀匠磨过才好使，俗称“开光”。磨剪刀匠给一把刀开刃，得磨600次左右，而用过的刀，至少也得300次左右。由于它成本低，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，所以过去有很多人从事这一行业。

磨之前，师傅先要看刀的刃部厚不厚，如果太厚，要先用戥刀戥，戥刀是一根铁棍儿，两头儿有把，中间是一长孔，把要戥的刀用楔子夹紧装在里头，把菜刀用一个铁卡子跟一块木板儿卡在一起，顶在板凳上用戥刀戥。菜刀戥好了，再用粗石磨，将茬口磨掉了，再用细石磨，边磨边在石头上刷水，以降低摩擦产生的热量。

传说磨剪刀这一行的祖师爷是“马上皇帝”，具体是谁，并无记录，只是他在起兵前因家贫，曾干过磨剪子这一行，所以大家称自己骑的板凳为“穿朝玉马”，而用来顶磨刀石的铁弓叫“马鞍”。

随着生活方式改变，现代人已不怎么磨剪子了，如今再想看到昔日的一景，恐怕很难了。

摘自《北京晨报》

“城镇化”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。所谓“城镇化”，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，说白了就是“农村人”转为“城里人”的一个历史进程。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，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。



古代最早的“城里人”

出现在何时？是什么人？

中国最早的“城里人”出现在何时？

“禹别九州”商人被视为最早的“城里人”

若上查三代，现代的“城里人”大多是农村人。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？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认为，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时间基本一致。由于商品交易形成，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，“城”、“乡”首现分离，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，即学术界所谓的“城市革命”。

中国最早的一批“城里人”是商人。早期商人都是“有身份的人”，只有贵族才有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中国第一批“城里人”的出现，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，距今至少4000年。从《史记》等史料记载分析，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场“城镇化”运动，应该是夏禹主导的。《尚书·夏书·禹贡》记载，“禹别九州，随山浚川，任土作贡。”即禹把全国划定徐、冀、兖、青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等九个“州”级行政区。“九州”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。

商朝因祖上分封于“商”这个地方而得名，商朝的人善于交易，其灭夏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，就是通过用“绣”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。商建国后，做生意已成商朝人的社会职业，“商人”概念因此而来。

古代第一波“城镇化”高潮是哪个时期？

《左传》统计出春秋时期新建城池达63个

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，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，社会变化剧烈，由“奴隶制”向“封建制”转型。由于周王室衰微，诸侯各自为政，大兴土木、构筑城池，“都城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城镇数量剧增，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，由此迎来了第一波高峰。

相当于现代“地级市”、“县城”概念的郡、县行政区划，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。有学者就《左传》所记做过统计，春秋时期新筑的城池多达63个，实有城市68个，另5个是重修



扩建的。

另据《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》里的数据，整个春秋战国时期35个国家的城镇总共有600个，其中晋国91个、楚国88个、鲁国69个、郑国61个、周国50个、吴国10个。实际数量当超过此数，有学者认为有八九百个。

这期间，“城镇化”运动搞得最好的，应该是齐国。齐国首都临淄规模很大，有几十万常住人口。据《战国策·齐策一》“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”条，纵横家苏秦看到，“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、鼓瑟、击筑、弹琴、斗鸡、走犬、六博、蹋鞠者……”

从苏秦所见所闻中可以发现，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，“GDP”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。因此，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。更有趣的是，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，临淄因此被国际足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。

据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诸书记载，齐国至少有81个大小城镇，以每城万户、每户5口人来算，平均每座城市有5万常住人口，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，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国都城“蓟”（今北京西南），也是在这一轮全国性城镇化运动中崛起的，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城市。

中国古人如何“农转非”？

南宋时期三年办一次“乡村户”转“坊郭户”

古代城乡居民比例，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是多少，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内容。其实很难有准确数据，现有的一些说法都是推算出来的，因此观点各异。

唐宋城乡人口分别称作“坊郭户”和“乡村户”。综合中外学者观

点，坊郭户占总人口比例，西汉在30%上下；宋代在12%左右；明代约为9.7%。到了清代，“城里人”绝对总数超过2500万，但城里人所占比例并不高，有学者推算，仅为宋代的一半左右。不难发现，古代中国的城镇数量一直在增加，城乡人口比例却一直下降，这与农业人口基数越来越大有关。

在中国古代，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。古代原则上是限制“农转非”的，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“重农抑商”思想有直接关系。

然而，古代的户籍同样“卡”不住古代农村人进城，特别是在饥荒年间，由于城里赈济及时，农民纷纷背井离乡，跑到城里谋生，于是形成无业流民云集的情况。

对这些没有户口的“流民”怎么处置？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。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的办法，积极救助，疏堵并用。首先为“流民”建立临时户籍档案，发给相当于现代“暂住证”一样的“收执”，凭此领取福利（钱、米等），“流民”离开时销毁“收执”。另一方面接收投资“移民”，有钱有条件的“流民”可转为“坊郭户”。

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搞一次，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“农转非”。据《宋会要·食货》记载，绍兴十二年（公元1142年），户部曾上奏：“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”。一批所谓的“西北流寓之人”，遂被划分户口等级，“农转非”而成为“坊郭户”。

但有条件“农转非”的流民毕竟是少数，更多“乡下人”还是要被动员、鼓励回乡务农，或住到城郊。

（倪方六）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